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研究读本

郭定平 主编

中国政府与政治
研究系列读本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党理论创新研究读本/郭定平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1
(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读本)
ISBN 978-7-309-15287-6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政党-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D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21155 号

中国政党理论创新研究读本

Zhongguo Zhengdang Lilun Chuangxin Yanjiu Duben

郭定平 主编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 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9 千

202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5287-6/D · 1066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 Preface

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生命力和原动力。本书是中国政治学界致力于政党研究理论创新的一份成果,也是我们努力推动中国政党研究学术发展的一种见证。创新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需要我们持续奋进,在前人研究成果与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本书成为未来政党理论创新研究的一块基石。

2019年我们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年又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不懈奋斗,创造了快速发展与崛起的中国奇迹。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偏向和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导向,中国政党研究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甚至一度出现了沉寂和衰落的倾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政党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相

关学术成果开始涌现。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发展奇迹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课题,人们自然就会开始研究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原因是世界各国的一些大党、老党的衰败在中国引发广泛关注和反思,特别是苏东剧变促使我们研究如何吸取苏东共产党垮台的教训。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阐发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新的时代课题,激发了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党的极大热情。中国国内的早期研究成果包括复旦大学当代中国政府理论丛书之一的《政党与政府》(郭定平著,1998年)、王邦佐等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萧超然、晓韦主编,2000年)、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2001年)、王长江等人自2002年起连续推出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等系列研究专著、林尚立的《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2002年)和《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2009年)等。随后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学术成果就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令人目不暇接。2002年6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找回共产党:中国是如何治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以会议论文为基础出版了柏斯德与郑永年共同主编的研究专著,发出了中国研究应该“找回中国共产党”的学术倡议。2008年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开明宗义就指出,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因素中,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许多海外著名中国研究专家纷纷出版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学术研究专著,例如,彭钊

(Frank N. Pieke)的《优秀共产党员：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与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s: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2009)。

随着中国政党研究的复兴,如何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创新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应该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政党研究学者们已经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了交流政党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并探寻未来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和生长点,2019年11月16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政党研究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着力探讨新时代中国政党研究的创新点和突破口,学者们围绕“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建构”“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透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于拓展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深度、促进讨论热度、提升学术高度、推动中国政党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经过交流讨论,中国政党研究理论创新的未来方向逐步明确,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概念创新。学术研究创新要从重新定义概念入手,中国政党研究涉及很多基本概念,例如,政党与政党制度、执政党与参政党等。在从西方引进的现有概念范畴之内讨论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已经面临不少局限,概念创新迫在眉睫。(2)理论创新。关于政党产生与发展、政党领导与执政的理论,很多来自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不相符合;有的形成于革命年代,未能与时俱进,已经与时代脱节。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政

党学说,并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实践,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理论创新将具有无比光辉的前景。(3) 议程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意味着必须拓宽视野,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的议程创新,特别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结合起来。(4) 话语创新。话语创新必须体现中国政党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和时代性。植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创新实践,就不可能是人云亦云、照抄照搬的低水平重复。与此同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政党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并与中国本土经验有效对接、有机融合。

本书就是在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根据专家推荐的优秀学术论文编辑而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资助了该项成果的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邬红伟先生和孙程姣女士在编校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牛乙钦博士在会务组织和稿件收集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对于允许我们重新刊印论文的各家杂志社、各位论文作者,对与会专家,对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各个单位和个人,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书中如有任何不当或纰漏之处,当由作者负责,并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指正。

郭定平

于复旦大学文科楼研究室

2020年4月28日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编 中国政党研究的新话语

- 中西政党概念的演变与比较 方 雷 李 宸 / 3
- 简论政党政治中的“类政党”与“准政党”现象 金安平 / 23
- 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 柴宝勇 / 37
- 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 郭定平 / 56
- 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贺东航 / 80
- 找回政党：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的话语建构 陈家喜 / 98

第二编 中国政党发展的新阐释

- 双重逻辑交互作用中的党治与法治 陈明明 / 119
- 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 唐亚林 / 139
- 超大规模先锋队政党的建党逻辑 汪仕凯 王冠亚 / 166
- 现代国家建设对执政党建设的回应性塑造 唐皇凤 / 185
-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现代化的路径分析——以党组的

现代化转型为研究对象 袁 红 / 196

第三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理论

从比较的视角看中西政党制度 周淑真 / 211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 黄天柱 / 227

政党认同的嬗变与重建：基于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

赵永红 / 245

新时代拓展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体系的思考：概念、构成与路径

任 勇 / 266

政党嵌入与体制吸纳——执政党引领基层群众自治的双向路径

陈 文 / 280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理路探析——以政治思想的宣传阐释为

视角 史拴拴 / 291

第四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课题

政党会期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周光辉

赵学兵 / 309

着力推进党领导一切原则下的党政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桑玉成 / 330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政党治理 刘先春 柳宝军 / 342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徐 勇 / 361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袁方成

杨 灿 / 379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党逻辑与中国作用——新型政党关系与

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研究 郑长忠 沈大伟 孙 鹏 李亚丁

王志鹏 / 396

第一编

中国政党研究的新话语



中西政党概念的演变与比较

方 雷 李 宸

《论语》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及至今日，世殊时异，政党存续于诸国政治之中却已百余年矣。“故曰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①环顾当代世界主流政治生态，除极少国家外，一国之权柄无不政党所操执，一国之政治无不政党所主导，以至于中西学者今谈及政治，言必称政党；而各国之间，又列党并立，迥然有异，互相竞逐，蔚为大观，是故对政党概念的学理把握亦因时因地而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理解现代国家政治必仰赖于对“政党”的理解，其内涵的历史流变又是因应不同时期各国政党政治变迁的学理归纳。以“政党”一词在中西语境下诞生与丰富的纵向递进为起点，从宏观上厘清政党概念的演变脉络，裨益于梳理政党概念的历史形态；以中西学者界定政党范畴的侧重之处的横向比较为延伸，从微观上观照政党概念的内涵殊异，有助于发现政党概念的本质面向。基于对中西政党概念的梳理与比较，又可从学理上更为深刻、全面地重释乃至重构政党概念。

一、中西语境下政党概念的演进与变迁

“party”一词源于西文，其词源为拉丁动词“partire”，释作“分

^① 秦猛：《政党说》，《清议报》，1901年5月9日。

开”。“然而,在17世纪之前这一词汇并没有以任何重要方式进入政治语汇。”^①盖因“party”是彼时西方抽象的集合概念,“主要是‘分析性的分割(analytic partition)’”^②,其于政治实践之中的运用为具体的历史相似物“sect”所滞,故而仅在较为含混和宽泛的意义上可与“sect”互为替用。“sect”意即“分裂”,词源为拉丁动词“secare”。“在17世纪‘sect’这个词开始和宗教相联系,尤其是和新教中的分裂教派相联系。”^③其时,“sect”词义引申作教派、派别,而在政治语言中所承载的分离、分隔之意渐为“party”专属。因此,“party”循此一路径引入政治语言之后果有二。

其一,“party”取“部分”之意,与“sect”类似,沦为“factio”的近义词。“factio”译作宗派、派系,来自拉丁动词“facere”,是西语中相对古老的政治术语,概指基于私益从事破坏活动和有害行为的政治社团。“派系”作为具象的实体,内起于结合部分意志的专擅,外化为威胁整体秩序的行为,自古罗马以来每每谈及必伴之以厌恶和敌视,而“party”无非是宗派的同义反复,所异者不过为邪恶本质的深浅。“政党乃政治之邪恶,而宗派则为所有政党中最恶者。”^④因此,政党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视为构成整体的部分异化的产物,是致力于反对整体而非与整体相和谐的部分,其与派系之辨尚不明晰。

其二,“party”建基于“factio”之上,故此作“政党”之解的“party”正是从“factio”中分化而来的。前述派系乃部分意志的专擅,其意志又以派系内私益的一致和情感的结合为物质基础与心

① [意]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页。

② [意]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页。

③ [意]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页。

④ St. Viscount Herry John Bolingbroke, *The Works of Lord Bolingbroke*,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Co., 2009, p.401.

理动力,而“政党”之说正是在派系的心理层面上的转向与超越,随后才在抽象意义上能够独立于派系,再后才可落脚于具象的、实体的政党一物。“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①

政党与宗派在心理层面上更为明显的区隔见之于休谟的著述中。休谟将派系划归为因利益结合的派系、由情感结合的派系和依原则结合的派系三类,其中依原则主要是依政治原则而结合的派系则为政党。“源自原则、特别是从一些抽象理论原则分歧产生的政党,只有现代才有。”^②原则与情感之区别在于其所赖以维持的理性内核:理性使政党既自洽于自我在意义上的逻辑联系,诠释和彰显自我的行为,又兼容于彼此在原则上的冲突与矛盾,避免陷入情感的盲目与狂暴。由此,“政党”一词的内核从情感向理性的心理置换,旋即意味着政党作为抽象之物从派系范畴中的分化。而抽象意义上的政党具象为实体意义上的政党的过程完成于埃德蒙·柏克,其演进之潜在线索则是对政党物质基础的认知转化。

现代政治学意义上政党概念之辨的突破成于柏克之手。柏克认为“政党是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③,并宣称政党之首要目的是“谋求一切正当手段,使持此种政见者获取某种条件,从而使他们得以借助国家的一切权力和权威,将其共同方案付诸实施”^④。其突破之处又呈现于以下两方面。

① [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页。

② [英] 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2页。

③ [英]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8页。

④ [英]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9页。

第一,政党的物质基础应在公益而非私益,进而将政党从抽象之物转为实体之物,以与派系之“恶”相殊异。柏克之论,首起于“团体”一词:“我的原则,实际也是顺理成章的原则,指引我们以团体的方式去行动。”^①任一人唯求诸团体,从团体而行之,方才足以获致恒常与稳定,且其团体若对公共事务报以极大热忱,则为“有德者的组织”,间或参与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之中,凭借公权谋取众人福利,可称之为“政党”;其团体若身居庙堂而蝇营狗苟,不啻为“小人”,即使假借“政党”之名仍不免于“派系”之嫌。政党之争与“卑劣地、偏私地去奋力捞取权势和利益之间的差别,不难分辨”^②,而后者恰是对派系之争的直观写照。

第二,政党的现实价值应为民主之必要而非民主之恶果,进而沟通社会与国家,赋予政党以正当性。实质上,政党之所以为民主之必要,是其物质基础由私益至于公益的演化轨迹在公共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当时柏克置身于英国国王与议会之间水火不容的激烈斗争的宏大政治背景中,其极为迫切的政治任务是在国王的横暴之下,促使“政治人物稳固地联合起来予以反击”,“使宪法回到它本来的原则上去”。^③ 举凡议会中德行之人皆须结成同盟,秉持人民公意的旗帜,以国家之权威抵御国王之强力,以国家之公益对抗国王之私益,使国家既免于分裂之患,又足以践行民主。政党的正当性正生于斯。故而柏克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必然有政党存在着。”^④

与之相悖,虽然柏克将政党的概念建立在公益与民主的基础

① [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6页。

② [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9页。

③ [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4页。

④ [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6页。

上,但毕竟不足以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而真正消弭政党利益所内含的派系特性,以至于柏克之前和之后的诸多学者仍将政党视为宪政实践中不得已的恶果。譬如博林布鲁克认为:“即使在政党完全堕落为纯派系之前,仍旧是某些人为特定目标及特定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①而邦雅曼·贡斯当则坦承:人们不能指望从政治组织中排除政党,否则自由的优点将不会得到保持,但又必须使政党尽可能地无害。^②有鉴于此,“政党”一词在西方所引致的概念辨析上的歧义与争论,可见一斑。

总之,在西方语境中,“party”一词在抽象意义上与“派系”的分离及在实体意义上与“政党”的耦合主要以三重特定面向的转变为内在支撑,即心理上由情感的驱动到理性的彰显,物质上因私益的结合到公益的聚焦,以及价值上从民主之恶果到民主之必要。此外,“政党”概念的变迁又以西方学者对这一政治现象所暗含的诸如否定、赞许或不置可否等复杂态度为表征,反映出早期西方学者在政党理念上或互斥或靠拢的矛盾倾向。

“政”“党”二字中国古已有之,而两者合为一处指代现今所谓的“政党”始自清末民初。而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政党”一词则在19世纪70年代转译自日文,其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引介与应用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其一,将“政党”类比“朋党”,视其为祸国之魁首。中国向有“朋党之患”,君主虽为王朝政治中心,权力却常旁落于宦官、强藩、外戚之手,譬如东汉党锢之祸,又如唐代牛李党争,是故后世多以党为禁。清末世人受此观念影响颇深,而对“政党”之说又无从认识,将形似而实非的两者等同就实属必然了。洋务之初,曾游历西

^① 转引自金安平:《对政党理念的知识考古学分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② 转引自[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页。

洋的近代学人马建忠论及英国政党政治：“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①

其二，将“政党”定为“议会党”，视“革命党”为“乱党”或“非政党”。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严复等立宪派承继戊戌时期结党立社的传统，组建政治团体，但当时民众仍广受“政党”误读的影响，所以立宪派政治团体多以“会”“社”自名，假“会”“社”之名而行“政党”之实，以防被视作“朋党”。为开启民智，立宪派成员又借《时务报》《湘学报》《国闻报》等刊物，宣传西方现代政党思想，譬如“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而无党”^②，又如“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③。然而，当时梁启超仅将“政党”偏狭地定义为“议会党”，进而直陈“革命党”的非法地位：“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故联合同人为一政党也。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④“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⑤革命党刊物《民报》则反诘之：“政党者，摇唇鼓舌以政见闻于朝。”^⑥可见，“政党”与“革命党”之分流为当时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普遍认同，两者之辨实质上是在救亡图存问题上革命与立宪的两种政治取向之间的相互攻讦。

其三，将“政党”内涵予以复杂化，其外延也日益泛化。自武昌起义和清廷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开放“党禁”以来，民主共和之声日隆，“政党”风气继以舒展，国内原有政治团体纷纷改为政党，从事国内政治运动者亦大都归于党籍，“政党”之名遂滥觞于中

①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6页。

② 梁启超：《论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清议报》，1901年5月18日。

③ 秦猛：《政党说》，《清议报》，1901年5月9日。

④ 秦猛：《政党说》，《清议报》，1901年5月9日。

⑤ 《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6页。

⑥ 揆郑：《哀政文社员》，《民报》第23号，1908年8月10日。

国,而“政党”的概念则不复固定。时有“政党”之论者三:一是就来源而论,即政党是部分国民代表的自愿集合,“政党者,由国民之一部分组织而成,用投票以操持国务,而实行一党之政策者也”^①;二是就形式而论,即政党是永续的正式政治团体,“政党者,以永久结社之性质,而以其一致之政见,为政治上之活动,以期其政见之得实行为目的者也”^②;三是就本质而论,即政党是为公共利益而行的团体,“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谋幸福,人民谋乐利”^③。

“政党”一词在中国近代的演变脉络实为现代化潮流在中国传统政治领域自然延展的侧写,是日益崩溃的封建制度之残余与欣欣向荣的现代政治之萌芽在“政党”这一新兴事物上的彼此交互。世人对政党的态度由避之不及到趋之若鹜,以至民国初年政党纷起、党争不辍,这反映出当时政党之辨仅流于一般形式而尚未真正在实质上达致共识,遂使“政党”之谓指或狭隘或宽泛、“政党”之义涵或简单或复杂,其深层矛盾则在于诸人所立足之价值点的对立,由此引起政党之价值论述上的冲突。较之于西方,中国语境下“政党”一词同样经历过从为人诟病到广受称颂的变迁。

二、中西视域下政党概念的共识与歧见

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发轫于西方,政党概念在中西语境中的演进与变迁反映出不同视域下学者们对政党形态与实质的认知渐次深化与递进的理路,其既有因共识而存在覆盖与交叉的范畴,又有因歧见而存在特殊和独立的领域。中西方共识交汇之处,是不同视域下关于政党形态与实质的一般性概念,涉及政党的若干

① 黄远庸:《政党浅说》,《民国经世文编》(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② 邵元冲:《政党泛论》,《国民月刊》第1卷1号,1913年5月20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